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理论指导系列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文秋芳 编著



Major Issu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理论指导系列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文秋芳 编著

Language Acquisi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 文秋芳编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10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理论指导系列)

ISBN 978-7-5135-0249-8

I. ①二… II. ①文… III. ①第二语言—研究 IV. ①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2123 号

出版人: 于春迟

项目负责: 段长城

责任编辑: 毕争 金玲

封面设计: 覃一彪

版式设计: 吴德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双青印刷厂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19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0249-8

定价: 45.9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02490001

前 言

2003年, Blackwell 出版了《二语习得手册》(*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主编为资深二语习得研究专家 Catherine Doughty 和 Michael Long。参与该手册撰写的 27 位作者均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该手册有八百多页, 内容囊括了二语习得研究中所有重要问题, 堪称是学界的经典之作, 可以视为本领域研究人员的“圣经”。诚然, 面对这样一部既权威又全面的手册, 我们为什么还要斗胆动笔再写一本《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Major Issues in SLA*) 呢? 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 《二语习得手册》是一本长达八百多页的英文原著, 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 犹如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山, 不便中国新手上路, 所以有必要用中文撰写一本更适合中国人读的书; 第二, 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发展迅速, 硕果累累, 该手册已经出版多年, 很多新文献新成果未能涵盖, 不能完整反映学界当前现状; 第三, 该手册没有涉及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 需要我们为此写上一笔。

2008 年春, 我着手拟定本书的写作思路, 并组织写作团队。有七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应用语言学博士生入选参与本书写作, 每人主笔写一章, 既分工又合作。我们充分发挥团队优势, 在大量阅读最新的中外文文献, 并归纳梳理、消化理解的基础上, 多次集体讨论各个章节内容, 互相审读文稿, 反复修改。本书不求面面俱到, 只求着重抓住二语习得领域中的要点、热点和富有争议的问题, 动态展开叙述, 组织文字。每章的思路是, 以不同意见的争辩为组织内容的出发点, 从理论取向的相左到实证研究结果的差异进行分析、梳理、评述, 最后介绍或者展望国内外最新发展趋势。全书力求做到语言简洁明快, 阐述深入浅出, 易读易懂, 避免“翻译式”、“堆砌式”的撰写方式。本书写成前后耗时两年, 于 2009 年年底脱稿。可以肯定地说, 本书的每位作者都以“readers-friendly”为撰写原则, 尽心尽力在为“读者服务”。作者虽已尽心尽力, 但效果如何还需要读者评判。

全书共有八章。第一章“认知派与社会派论战20年”由文秋芳主笔。本章概述了认知派与社会派的形成与发展,并系统阐述两派在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哲学倾向等方面存在的严重分歧。笔者对两派的争辩进行了分析与评论。本章有统领全书的作用,勾画了二语习得研究的历史与发展脉络。希望读者首先阅读,仔细思考,有了宏观视野,再去阅读后面的章节,易于把某个问题置于全局背景下,形成局部与整体的有机联系。第二章“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由江进林主笔。笔者评析学习第二语言显性与隐性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多年来,关于这两种学习方式的对象、功用、特征、优劣、测量方法,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争论不断,有些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本章对这些争议及其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系统归纳。第三章“语言输入、输出和互动”由李芝主笔。笔者从社会派与认知派两个不同视角比较了人们对输入、输出以及互动作用的认识存在的分歧,并探讨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认识。第四章“石化现象”由孙海洋主笔。笔者梳理了对“石化”这一现象的系列争议及其理论根源,并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归纳分析,最后还介绍了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第五章“语言迁移”由朱美慧主笔。笔者首先回顾了语言迁移研究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然后系统介绍了围绕语言迁移研究的争议焦点,接着总结了语言迁移的实证研究,最后介绍了国内外语言迁移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趋势。第六章“自动性”由高霄主笔。本章首先概述了相关的系列争议,例如自动性的特征问题、自动性与非自动性的区别、自动化过程等,然后探讨了不同学习理论对自动处理模式、自动处理条件以及练习作用的不同主张,接着归纳相关的实证研究,最后展望国内外自动性研究的发展。第七章“年龄问题”由莫嘉琳主笔。笔者首先用框图概括了该问题的相关概念及理论,然后按照争议的脉络梳理了各种不同的实证研究,例如围绕初始速度、学习过程机制、最终成效争议开展的年龄问题研究等,接着归纳了对年龄问题研究结果所提供的神经心理解释、社会心理解释、认知解释,最后依据年龄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了对教育规划以及教学的启示。第八章“社会文化理论”由魏梅主笔。本章与前面七章的结构不相同,原因是该理论还处于发展期,我国二语习得界对此理论还不太熟悉。笔者采用了引介与评述的方法。首先,她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与基本理念,然后较为系统地

评述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接着说明社会文化理论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以及作者对该理论的反思，最后概述国内相关文献，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书写作团队在成书的两年时间里，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从查阅文献、收集资料、确定选题、草拟提纲、写成初稿，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直到最后定稿，每一步我们都走得扎实，做得辛苦。经历这一场洗礼，我们都获得了意外的收获。本书全体作者从中学到了很多，有了很深的领悟，由此也站到了潮头，看清了学科前沿的发展。

可以设想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二语习得的新手上路，必将对本研究领域的学者及时把握最新的学科动态带来极大便利，必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在阅读过程中辨明理据、寻找焦点、确定选题。

这里要特别感谢博士后任庆梅教授，她仔细、认真地审读全书，并对文稿中的行文与引文格式进行了逐一检查校对，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毕争和金玲，她们为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没有她们的精雕细刻，本书就难以呈现到您的面前。

文秋芳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2010.1.24

目 录

第一章	认知派与社会派论战20年	1
第二章	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	16
第三章	语言输入、输出和互动	53
第四章	石化现象	82
第五章	语言迁移	125
第六章	自动性	166
第七章	年龄问题	212
第八章	社会文化理论	256

第一章 认知派与社会派论战 20 年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有 40 年历史。该学科目前已形成两大对立阵营：认知派与社会派（或社会文化派）(Larsen-Freeman, 2007; Zuengler & Miller, 2006)。认知派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社会派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例如 Frawley & Lantolf, 1985; Lantolf & Frawley, 1988）。1997 年，《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组织公开论战，为两派的交流搭建平台，辩论持续到 1998 年。论战双方情绪对立，矛盾激化 (Watson-Gegeo, 2004)。时过 10 年，2007 年 12 月，《现代语言》再次组织两派辩论，双方没有丝毫妥协的迹象。

本文将阐述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认知派与社会派之间的争辩，旨在让我国二语习得研究者认清这场争辩的本质，引发深层次的思考，进一步推动我国二语习得研究向纵深发展。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认知派与社会派的形成与发展，第二部分综述两派存在的主要分歧，第三部分评析两派的争辩。

1. 概述认知派与社会派的形成与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认知派与社会派的争辩，我们有必要了解两派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只有将争辩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我们才能全面地、辩证地认识两派的立场与观点。

1.1 认知派简史

早在上个世纪中期，Fries, Lado, Skinner, Weinreich 发表了系列文章阐述了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观 (Larsen-Freeman, 2007)。根据他们的理论，学习

者好比被外界操控的“机器人”，学习就是在外界正反馈的刺激下，通过反复操练，逐步形成习惯。学习成功的关键是适时提供正反馈。1959年，乔姆斯基(Chomsky)在批判 Skinner 的行为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推出了普遍语法理论。他认为所有语言在深层结构上享有共同特征。儿童能够快速高效、不费气力地学好母语，就是因为先天拥有这些共同特征。他们的语言行为不是成人语言的简单镜像反映。外界输入激活个体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个体借助于这一先天机制对输入进行创造性加工，内化为有限的抽象规则，最终依据这些数量有限的规则产出无数语法规范的句子。

在乔姆斯基理论的直接影响下，上个世纪60年代，有学者挑战行为主义理论。他们开展了两类研究(Larsen-Freeman, 2007)：(1)对二语学习者错误的研究(例如 Corder, 1967; Selinker, 1972)；(2)英语语素习得研究(例如 Bailey, Madden & Krashen, 1974; Brown, 1973; Dulay & Burt, 1974)。这两类研究的结果奠定了二语习得认知理论的基础。他们将二语习得理论从行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二语学习者成了有思维能力的独立认知个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对学习主体作用的肯定无疑是一种进步。二语习得的研究内容逐步明确为：第一，储存在大脑内的二语知识体系；第二，习得二语知识的过程。前者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储存在个体大脑中的二语知识体系的特征；后者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个体学会某种二语的过程。运用 Gregg (2003)的术语，前者是建设二语习得的特征理论(SLA Property Theory)，后者是构建二语习得的过渡理论(SLA Transition Theory)。

上个世纪90年代，认知派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他们内部争论的问题集中在“语言如何习得”上。“特殊先天论”者相信语言习得主要取决于人生来具有的语言习得装置，“一般先天论”者认为学习语言与学习其他认知技能一样，由人生来具有的一般学习能力与认识能力决定(O'Grady, 2003)。特殊先天论与一般先天论的相同之处是：学习者内化储存在大脑里的是抽象语言规则。与先天论相对抗的是“后天论”(Valdman, 2002)。“后天论”认为语言学习基于后天接触的范例(Instance)，决定语言学习成功的因素是范例的频次与质量(Ellis, 2003)。部分学者(例如 Skehan, 1998)提倡运用“基于规则”与“基于范例”两种平行并存的学习模式解释二语习得的

过程。

Larsen-Freeman (2000) 总结了认知派研究的主要问题: (1) 母语对二语的影响, (2) 惯用语 (formulaic utterances) 的作用, (3) 可理解性输入的充分性, (4) 自由变体是否存在, (5) 注意 (noticing) 的必要性, (6) 明示教学 (explicit instruction) 的价值, (7) 不接口立场 (non-interface position) 的可行性, (8) 负反馈的必要性, (9) 年龄的关键期是否存在, (10) 成功学习者的策略是否可教, (11) 元语言知识的作用。

Gass 等人 (2007) 认为, 尽管认知派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受到社会派的挑战, 二语习得作为认知科学的总体方向并未由此改变。他们的结论主要依据三种主要二语习得研究杂志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最近 10 年来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在这三种杂志 212 篇报道实证研究的文章中, 仅有 16 篇依据了社会派理论。当然, 这样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现实。

1.2 社会派简史

社会派阵营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他们的理论背景比较复杂, 有的受苏联维果茨基 (Vygotsky) 社会文化理论 (Socio-cultural Theory) 和勒恩提叶夫 (Leontiev) 活动理论 (Activity Theory) 的影响, 有的基于会话分析理论 (Conversation Analysis Theory), 有的信奉语言社会化理论 (Language Socialization Theory), 有的相信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有的以巴赫金的对话主义 (dialogism) 为基础 (Swain & Deters, 2007)。

对社会派影响最大是维果茨基理论。维果茨基理论主要包括中介说 (mediation) 与内化说 (internalization) (Lantolf, 2006)。中介说主张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物质或符号工具作为中介。语言是高层次认知的符号工具, 儿童运用这一符号工具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与他人进行文化与思想的交流, 还运用它进行反思与自我调节, 甚至儿童的自言自语 (private speech) 也能够帮助克服认知过程中的困难与障碍。简言之, 中介说认为语言是人发展的重要符号工具, 脱离人的过去历史以及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就无法研究语言的特点与规律。

内化说主张人的意识与认知是社会化和社会行为的终结产品。儿童认知发展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社会交际活动，第二阶段为个体内部心理活动。社会交际活动先于个体的心理活动。这种从外部、人际间的活动形式向个体内部的心理过程的转换就是“内化”。

根据维果茨基的理论，Frawley & Lantolf (1985) 率先批评二语习得认知派理论。1994年，Lantolf 编辑了《现代语言》杂志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的特刊《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同年 Lantolf & Appel 主编了《维果茨基的二语学习研究》。Breen (1985), Block (1996), van Lier (1994) 等人也先后撰文严厉指出认知派理论的局限性。1997年，《现代语言》组织公开论战 (Ladford, 2007)。该杂志登载了 Firth & Wagner (下面简称为 F & W) 撰写的论文《论话语、交际与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基本概念》(O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LA research), 并在同期刊登了持不同意见的作者对 F & W 文章的回应。

2007年12月,《现代语言》杂志再次组织两派辩论。该杂志不仅重新刊发了 F & W 1997年发表的文章,而且发表了2007年 F & W 撰写的《作为社会成绩的二语/外语学习: 详评重述的二语习得》(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s a social accomplishment: Elaborations on a reconceptualized SLA)。与此同时,该杂志邀请了一批著名学者讨论 F & W 文章发表10年来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 Canagarajah, Block, Freeman, Gass, Kramsch, Lantolf, Larsen-Freeman, Swain, Tarone。

Larsen-Freeman (2007) 依据学者对待 F & W 1997年文章的看法,将他们分为三种情况:(1) 坚决支持(例如 Block, 2007; Canagarajah, 2007; Kramsch & Whiteside, 2007; Lantolf, 2007; Mori, 2007)。(2) 部分支持(例如 Ellis, 2000; Larsen-Freeman, 2007; Swain & Deters, 2007; Tarone, 2007)。(3) 坚决反对(例如 Gass, 1998; Gass, et al., 2007; Gregg, 2003; Kasper, 1997; Long, 1997; Poulisse, 1997)。

2. 综述两派存在的主要分歧

认知派与社会派在诸多问题上存在一系列分歧。笔者将两派分歧大致归纳成以下五个方面加以阐述 (Larsen-Freeman, 2007) (见表 1)。

表 1 认知派和社会派的主要分歧

	认知派	社会派
语言观	语言是心理现象, 由抽象规则组成, 存在于个人大脑中。	语言是社会现象, 与文化混为一体, 无法分割, 存在于人们的交往活动中。
学习观	学习者将输入有选择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 通过不断地输出, 逐步将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	学习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 获得语言+文化知识, 转而成为个人脑内活动的材料。
研究对象	研究语言习得, 不研究运用, 研究的焦点是学习者大脑中抽象的语言体系特征及其变化情况。	研究语言运用, 主张语言习得与运用为连续体, 无法分割, 研究的焦点是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交际活动成功的特点。
研究方法	从客位 (etic) 角度描述, 采用量化法, 强调客观性、公正性, 反对掺杂研究者的个人观点。	从主位 (emic) 角度描述, 多采用质化法, 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 要求研究者能够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理解、阐述社会交际事件。
哲学倾向	主张现代派观点, 相信人与社会可以分为两个实体, 语言与文化可以分割成两个独立的抽象体系。	坚持后现代派观点, 相信人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融为一体, 不可分割。

2.1 语言观

认知派认为语言是心理现象, 由抽象规则组成, 储存于个体大脑中, 有独立自主性, 文化 (意义) 可以从语言中剥离。语言规则虽然有限, 但可以创造出数量无限的句子。这些句子的语法性不受说话场景、交际者差异等因素的制约。

社会派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体现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每个社会情景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与作为中介的语言紧密相连，无法分离。语言存在于社会交际活动中，而不是由独立于具体交际活动的抽象句子组成。为了表示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的关系，Agar（引自 Lantolf, 2007）创造了一个词：**languaculture**，笔者建议将其翻译成“语文”，这里的“语”代表语言，“文”代表文化。社会派相信“语”与“文”生来为一体，根本不可分。Lantolf 认为语文不仅能够反映人们的意识，还能够体现人们的感知、情感、思维以及行为的方式。

社会派指责认知派把语言看成管道，把意义 / 文化看成内容，交际就好比说者把内容装到管道里送给听者，听者从管道的另一端取出内容。这种机械的语言观、交际观完全不符合现实生活中语言的运用。

2.2 学习观

认知派认为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人脑好比信息处理器，它将外界输入转化为摄入，作为陈述性知识储存起来，再经过不断练习，逐步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其间学习者形成假设，通过外界反馈检验假设、修订假设，使自身的语言体系不断完善。学习的进步体现在大脑内部知识体系的变化，其学习过程呈现出普遍性特征。

社会派主张学习是内化的过程（*internalization*），Lantolf（2006: 90）将其界定为“社区成员通过交际活动获得交际需要的符号工具，继而转化为心理活动工具，作为心理活动中介的过程”。他进一步将内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人际交流（*interpsychological*），学习者参加社会交际活动，通过群体互动，获得文化符号工具；第二阶段为人内交流（*intrapsychological*），学习者通过个体的努力，将文化符号工具转换为个体心理活动的工具。人脑内部有两个“我”，社会派称之为“I-me”，一个我（I）选择说什么，另一个我（me）评价、监控、调整选择的内容。这两个“我”在互动、交流。社会派强调在语言习得中，人际活动先于人内活动。尽管有时个体独自思考，没有其他人参与，但人内活动总是以人际活动为中介，因为过去经历的人际活动能够跨越时空储存于

大脑中，与人内活动交织在一体，形成连续体。Swain (2006) 认为语言产出 (languageing) 是人内活动与人际活动的接口。一方面，语言产出行为是思维进步、学习者理解复杂概念的关键；另一方面，正是语言产出使得个体内部的心理活动与人际间的社会活动相联系。通过这些活动，学习者将自己的思维转化成文化形式，这些形式又成为进一步反思的材料。

2.3 研究对象

认知派 (例如 Gass, Lee & Roots, 2007; Long, 1997) 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而不是语言的运用 (second language use)。Long (1997), Kasper (1997), Gregg (2003), Gass et al (2007) 都明确表态, 二语习得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考察学习是如何发生的, 特别要弄清楚哪些心理过程、哪些学习者因素对语言习得有贡献, 学习是否需要通过以及怎样通过语言运用而发生。他们反对将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真实语境中的二语运用。Gass (1998) 建议将其归属于新学科“二语研究”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以区别于二语习得研究。二语习得研究的终结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论, 用以解释除母语以外的任何语言在任何环境中被任何人习得的情况。换句话说, 这个理论应该不受学习环境、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认知派提出要“优化”二语习得理论 (Gregg, 2003; Long, 1993, 2007)。

社会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运用, 而不是语言习得。研究二语运用就是考察二语如何成功地运用于社会交际活动中。他们不同意运用是学习结果, 或者是学习手段。他们相信习得与运用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Firth & Wagner (2007: 806) 指出“没有运用, 习得不会、也不可能发生。语言的习得必须以运用为基础”。如果要了解二语习得发生的情况, 必定要考察二语的运用。语言能力具有过渡性、情景性和动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 语言使用者永远是学习者。例如, 多语境中新移民虽然语言资源极其有限, 但他们能够成功地进行交际, 完成商务活动, 这些新移民在运用语言的同时也在学习语言, 因此他们既是语言的使用者, 又是学习者。

社会派反对认知派以建立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二语习得理论为由，歧视甚至扼杀其他不同流派的理论。Lantolf (1996) 以《二语习得理论建设：允许所有的花都开发》(SLA theory building: “Letting all the flowers bloom.”) 为题批判了认知派的“绝对真理”观，呼吁为各种理论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而不是只保护少数“有权势”的理论。在二语习得理论建设中，一定要杜绝霸权主义。

2.4 研究方法

认知派从客体角度 (etic) 描述学习者大脑中的语言体系及其变化。他们通常运用实验法，操控某些变量，例如调整输入的凸现度、频次，完成任务的准备时间、要求等，观察学习结果的变化，也有通过访谈、有声思维等质化法探究人脑内部语言加工或产出的情况。

社会派从主位角度 (emic) 出发，理解、解释二语交际者如何在与别人的交际中成功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社会派不赞成采用实验方法，通过改变学习条件或任务要求来探究某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主张收集多语环境中的自然交际语料，考察交际者多重身份更替的体验以及多种语言的互动，阐释交际者成功交际的过程。

2.5 哲学倾向

认知派与社会派的分歧主要源于不同的本体论立场。认知派坚持的是二元本体论，主张人与社会是互相独立的两个实体，语言与文化可以分离为两个自主系统，互不影响。社会为学习者的外部环境，可以激活人的先天语言机制，或影响个体的语言学习。认知派关注的是学习者个体语言系统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发展的过程，研究的基本单位是脱离语境的句子，主要任务是从现实语言现象中排除情景因素、文化因素的“干扰”，概括出正常人脑中储存的抽象语言体系。

社会派主张人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融为一体。因此，社会派与认知派争论的焦点不是人的认知是否受社会活动的影响，而是人的认知是否能够独立于社会活动。社会派相信人的高层次认知活动内含在社会活动的参与过程之中。社

会活动的载体可以是具体工具，也可以是抽象符号工具。语言是社会交际活动的重要中介，研究语言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体现社会活动的话语 (utterance)，而不是所谓的由规则控制的抽象句子。

3. 评析两派的争辩

3.1 两派之争的由来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社会派出现。社会派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出发，指出在二语习得领域认知派所做研究的局限性，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二语习得规律。当时，认知派已历经二十多年，开展了很多相关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基本站稳了脚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 Zuengler & Miller (2006) 描述两派争辩的历史可以看出，社会派出现之初挑战认知派时，认知派没有任何过激反应，两派似乎相安无事。随着社会派队伍的壮大，认知派在二语习得领域的霸主地位不断受到挑战，两派的关系开始逐步紧张。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两派争论“二语习得理论是否要多元化”。1997 年《现代语言》刊载 F & W 的文章，触及并动摇了认知派苦心经营多年奠定的理论基础，引发了认知派的极大不满。两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认知派指责 F & W 自身不从事二语习得研究，对该领域根本不了解。他们所从事的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或语用学范畴 (Gass, 1998; Long, 1997)。随着两派争论的加剧，Long (2007: 164) 大声疾呼：在社会派的批评与攻击对二语习得学科发展产生破坏作用之前，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及时的反击，否则影响二语习得科研项目经费的获取，阻碍学科的正常发展，导致视线转移，让众人的时间与精力浪费在争论那些毫无价值的问题上。

3.2 评析两派基本概念之争

F & W 质疑二语习得领域沿用了 30 年的基本概念：本族语者、中介语、

学习者。对此笔者部分赞成，部分反对。

F & W 批评认知派长期使用的“本族语者”概念没有现实依据。认知派心目中的本族语者指的是单语语境中的操标准语言的理想人物。在当今多语环境中的交际，这样的理想人物几乎不存在。例如，一群交际者运用英语作为共同交际语进行商务谈判，可能交际者全部来自非英语国家。笔者赞成 F & W 对“本族语者”的看法，但摒弃这样的概念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二语教学应该以什么人的语言为依据？如果不以本族语者的语言为标准，我们的标准该是什么？

F & W 指出认知派长期使用的“中介语”概念带有贬义。研究中介语者关注的是说话者与语言之间的距离，而不是说话者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关注的是说话者的语言资源缺陷，而不是他们成功交际的过程与结果。凡是经常使用、但不符合本族语者语言使用习惯的语言形式都被认为是石化现象 (fossilization) 的结果。事实上，这些所谓不规范的形式很可能是说话者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和交际目的所采取的策略 (Firth & Wagner, 1997)。F & W 认为研究者应该侧重二语使用者运用语言的成功特征，而不是语言是否规范。需要指出的是，当初 Selinker (1972) 提出中介语时，完全是出于对学习体系自身价值的肯定。他认为中介语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特点，它不是简单地反映母语的干扰。学习者通过自我构建的假设，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所以应该将它视为一种自然语言体系。同时他还指出中介语是一种过渡语，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变化 (Larsen-Freeman, 2000)。笔者认为，学习者使用的语言是不是要称之为“中介语”并不重要。交际能否完成和语言是否规范是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两个侧面。如果要诊断二语习得的语言是否规范，我们可以用“中介语”给学习者所掌握的语言定名。如果要探究双方是否已经顺利完成交际，就没有必要引出“中介语”这个概念。

F & W 指责认知派没有认识到二语学习者多重身份的变化，使用的仅是“学习者”一种身份。在多语交际环境中，二语使用者又是二语学习者。他们在学中用，用中学。F & W 进而主张二语习得研究应该更多地研究真实语境中的二语使用，而不是局限于正规教育中的二语习得。对这个主张，笔者不敢苟同。虽然笔者同意 F & W 的学与用没有清晰分界的观点，但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与用，终究与商人在多语环境中的学和用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的语言运用是